

DOI:10.13718/j.cnki.xdsk.2025.03.024

历史研究

引用格式:刘燕妮,刘志英.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新旧转型的调查透视(1908—1937)[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316-328.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新旧转型的调查透视 (1908—1937)

刘燕妮,刘志英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基于东亚同文书院1908—1937年间的四川金融调查档案,揭示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金融转型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四川货币体系经历了从币种相对单一到极度紊乱,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制度性变革;同时新式金融机构崛起,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向近代转型;另一方面,其转型具有显著的地域封闭性,外国货币与金融机构渗透有限。这种因地缘而带来的外来势力侵入的滞后性被日本战略利用,成为其深入中国腹地的决策支点。试图突破传统金融史研究局限,通过敌对势力调查资料构建逆向分析视角,将区域金融史研究从沿海向内陆延伸,揭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空间差异性。为理解当代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提供历史镜鉴,强调在扩大金融开放过程中需警惕历史路径依赖可能引发的结构性风险,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东亚同文书院;四川;金融调查;调查透视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5)03-0316-13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试图改变东亚国际秩序,为本国的工业寻找充足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于是对华展开大规模调查,并希图以此提高对欧美的竞争优势,削弱欧美在中国的影响。日本的对华调查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类。官方调查以外务省、农商工省、军部为代表。民间调查机构有日本国内的工商机构及其派驻中国的各类调查机构,还有在华扎根的日本团体。在众多日本对华调查机构中,满铁调查部与东亚同文书院分别是官方与民间调查的代表。

满铁调查部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于1907年设立,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最大间谍机构。该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名称各异,职能和调查重点也有所变化,但其调查活动始终围绕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与殖民统治需求展开。调查范围从最初的东北实地调查,到“九一八”事变后,受军方委托,着手调查华北情况。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满铁调查部除华北、华东外,还在西北的新疆、内蒙古,华中的湖北、湖南,华南的广东、海南等地进行大量实地调查,但对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几乎没有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满铁调查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

作者简介:刘燕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ZD066),项目负责人:周建波。

巨大成就^[1-2]。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建立的一所以商科为中心的海外大学,1900年5月在南京创办,原名为南京同文书院,1901年初迁往上海,改名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旨在培养“不通过买办也能跟中国人直接做交易的商业人材”,开设专业是商科,最大特色是每年组织即将于次年毕业的学生在中国围绕某一专题进行大旅行调查,即所谓“踏查”^①。参与踏查的学生不仅写旅行日记,还要写调查报告提交学校。每年,东亚同文书院都会将调查报告书呈给日本外务省、军部、农商工省及东亚同文会^{[3]194}。由此可见,东亚同文书院是一所重要的对华情报机构。其调查持续40余年,先后有5000余名学生参与,踏查范围遍及西藏以外中国的所有省区,尤其是对中国西南地区有较为深入、持续时间较长的调查活动,调查地域之广均超过“满铁调查部”,堪称日本民间对华调查的典型。这些调查为日本掠夺中国资源、制定侵华政策等也同样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迄今,这些文献仍具有警示国人勿忘历史的意义,也为学术研究留下了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参考资料。

近年来,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聚焦于其在中国及东南亚的调查活动与情报职能。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揭示其服务侵华战略的本质和在情报网络中的核心作用^[4-5]。还有些则通过地域性个案深化了对调查体系的认识^[6-8]。相较之下,学界对东亚同文书院在四川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涉及这一领域^[9-10]。四川是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踏查的重点区域之一,形成了丰富翔实的调查材料。东亚同文书院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1917年版)及《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上、下)(1941年版)等有关四川的文献。然而,现有研究仅是一个开始,实际上,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学生对四川的反复踏查所形成的考察记载和文著,贯穿了从清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经济的调查中,金融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来看,这方面却少有人关注。本文基于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的实地调查文献,系统梳理近代四川金融业的变迁轨迹,试图还原该机构视角下四川金融新旧转型的历史图景,并从中提炼对当下川渝金融发展的镜鉴意义。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看似客观的学术记录,实则暗含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反华价值判断——书院以“学术踏查”为名,对中国腹地展开系统性渗透式考察,其金融调查数据最终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战略需求,这种学术外衣与侵略本质的矛盾性,值得后世研究者注意。

一、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的踏查与金融调查资料的形成

1901年东亚同文书院在上海建立,从1902年开始,即将学生组成不同批次、范围的调查团,对中国社会状况进行实地踏查。由于经费限制,东亚同文书院最初调查范围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以及由沪上溯至武汉的长江流域。1905年,受外务省指派,东亚同文书院派出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等5名二期毕业生赴今天的新疆、蒙古国等地调查,其中新疆派遣员林出贤次郎,历时2年,收获最大。1907年,日本外务省发给东亚同文书院“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3万日元,作为对林出贤次郎等五位书院学生调查中国西北成果的“奖励”。这3万日元分三次用于第五、六、七期生的大旅行调查上^{[3]188-189}。此后,东亚同文书院每年都会获得日本外务省的经费支持,踏查逐渐从东中部向西部地区扩展。

① “踏查”:实际にその地へ出かけていって調査すること。(新村出编:《広辞苑》第七版,東京:岩波書店,2018年,2053頁。)译为去实地调查。本文中的基本内涵指采用线路方式进行的一种实地调查,主要用于强调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进行的与具体的线路或批次相联系的实地调查。

(一)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的踏查

四川偏处于中国西南腹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美誉,但却因峡江险滩,山脉阻隔,暂时阻挡了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的步伐。直到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将宜昌作为通商口岸,英国官员驻守重庆,为外国人进入四川乃至西南提供了保障,英、法、日等国众多官员、学者、传教士、探险家、记者、通商者、科考者等纷纷来川考察。1890 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重庆辟为商埠,此后,在对外贸易往来增加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游历者来到四川。当英国取得重庆开埠特权时,日本还没有从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不能和已经取得这一特权的英、法、美等国平起平坐。对此,日本极不甘心,处心积虑要达到自己的目的。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日本终于取得了与英国一样的重庆开埠权,日本势力虽入川较晚,却后来居上,加大了向四川的渗透。

1907 年,日清轮船公司开通上海至宜昌航线,1908 年,东亚同文书院组织第六期生大旅行调查,开始将四川纳入考察范围^[11]。此后,四川便成为书院调查的重点区域之一,到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 29 年中,对四川的踏查如下表:

表 1 1908—1937 年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踏查情况统计表^[12]

调查期数、班名及时间	主要调查人员	调查路线
第 6 期(1908 年—1909 年正月)	不详	湖南—四川—云南
第 7 期西鄂巴蜀班(1909 年 7 月 1 日—10 月 24 日)	本城清规(班长)、森田正治、三田宗治郎、平鹤松、稻毛重毅、佐山诚治、西尾知	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巴东—云阳—万县—成都—梁山—垫江—长寿—重庆—合州—顺庆—西充—南部—保宁—昭化—广元—宁羌—沔县—汉中—襄阳—仙桃
第 8 期云南四川班(1910 年 7 月 1 日—11 月 15 日)	藤井荣左卫门、贺来敏夫、桐泽信六、根本永雄、村田孜郎、米内山庸夫	上海—香港—海防—河内—老开—河口—蒙自—阿迷—宜良—东川—昭通—叙州—自流井—嘉定—峨眉—成都—重庆—宜昌—当阳—汉口—南京—上海
第 9 期湖南四川班(1911 年 6 月 25 日—11 月 21 日)	今井美代吉(班长)、小岛利一、榊原直矢、藤原忍、松本库太郎、和田重次郎	上海—汉口—常德—沙市—宜昌—巴东县—恩施—咸丰—黔江—酉阳—龚滩—涪州—重庆
第 11 期陕西四川班(1913 年 6 月 29 日—11 月 26 日)	胜村介之贞(班长)、油本迹久、高桥芳雄、细谷藤吉、星野龙男、有井勘一、保木本利治	上海—金州—北京—洛阳—长安—成都—乐山—峨眉山—叙州—自流井—荣昌—重庆—宜昌—上海
第 12 期湖北四川班(1914 年 6 月 29 日—12 月 5 日)	杉山三树雄(班长)、村上长治、林重治、中村藤九郎、川村臣三郎、西岛时义	上海—汉口—宜昌—夔府—万县—垫江—广安—顺庆—潼川—成都—雅州—天全—打箭炉—清溪—嘉定—叙府—重庆—宜昌—上海
第 14 期湖北四川班(1916 年 6 月 26 日—11 月 9 日)	田中健吉(班长)、牧野重利、南井几久司、吉松三四郎、森永义忠、柴田周介	上海—汉口—孝感—云梦—应城—德安—京山—安陆—宜城—襄阳—老河口—均州—鄖阳—白河—洵兴—兴安—紫阳—城口—太平—东乡—绥定—三汇场—渠县—广安—合州—重庆—宜昌—汉口—上海
第 15 期贵州第二班(1917 年 6 月 24 日—10 月 18 日)	金泽平陆(班长)、日暮英二、友水忠治	上海—香港—广东—梧州—柳州—西安—三江—古州—都江—八寨—都匀—贵定—龙里—贵阳—修文—遵义—仁怀—赤水—合江—合津—重庆—宜昌—汉口—上海
第 16 期陕西四川班(1918 年 6 月 30 日—11 月 1 日)	细田年三(班长)、高田浩一、笹木英舒、久重福三郎、故唐住义明	上海—南京—徐州—郑州—洛阳—观音堂—潼关—许昌—襄阳—南阳—宜城—宜昌—万县—梁山—垫江—长寿—重庆—宜昌—汉口—上海

调查期数、班名及时间	主要调查人员	调查路线
第18期云南四川矿业班 (1920年5月—11月8日)	千原楠藏(班长)、森利嗣、山根正直	上海—香港—广东—海防—河内—老开—蒙自—阿迷—云南—东川—昭通—叙州—嘉定—峨眉—成都—简州—资阳—自流井—富顺—泸州—重庆—忠州—万县—宜昌—沙市—汉口—上海
第18期湖南四川油业调查班 (1920年7月7日—10月15日)	松尾良人(班长)、村上义助、镰形幸作、丸山泰男、原吉平	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常德—辰州—铜仁—镇远—贵阳—遵义—綦江—重庆—万县—宜昌—沙市—汉口—上海
第19期汉水嘉陵江流域经济调查班 (1921年6月26日—10月12日)	土山外男(班长)、太田勇、新田亮、星忠亮、中西义男、田中信一、片见宏	上海—汉口—宜昌—重庆—成都—潼川—合川—顺庆—广元—汉中—兴安—老河口—樊城—安陆—仙桃—镇蔡甸—汉口—上海
第19期长江上游经济调查班 (1921年6月26日—10月12日)	本多真一(班长)、故绵贯诚、上杉益喜、细田常次郎、井上卓次、田井中叶三、丹羽省吾、石川顺	上海—汉口—长沙—常德—辰州—铜仁—镇远—贵阳—辰台—赤水—泸州—自流井—成都—邛州—雅州—天全—打箭炉—清溪—嘉定—峨眉山—叙州—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上海
第19期两湖四川调查班 (1921年6月26日—8月28日)	长田安次(班长)、石村佑二、吉木正光、大越龙一、柳俊治、则俊增治、芦刈吉治	上海—汉口—长沙—湘潭—常德—沙市—宜昌—重庆—成都—峨眉—重庆—汉口—上海
第20期云南四川经济调查班 (1922年6月25日—9月28日)	福冈重德(班长)、安泽嘉藏、宗片胜见、金子繁太郎、松井益太郎、高野贞治、高谷大二郎	上海—香港—广东—海防—河内—老开—阿迷—东川—昭通—屏山—叙州—嘉定—成都—资阳—自流井—富顺—泸州—重庆—万县—宜昌—沙市—汉口—上海
第20期四川省盐业调查班 (1922年6月25日—9月10日)	清水成鉴(班长)、冈秀一、冈村正文、甘粕四郎、川岛清、金井十郎	上海—汉口—宜昌—重庆—自流井—嘉定—峨眉—成都—剑阁—广元—汉中—西安—骊山—潼关—观音阁—洛阳—北京—天津—大连—青岛—上海
第20期四川省纤维原料调查班 (1922年6月25日—8月29日)	中山进(班长)、今井贞治、西田松雄、泷田重男、虫明猛、内山学、小日正夫、小高清	上海—南京—汉口—宜昌—重庆—永川—荣昌—隆昌—富顺—自流井—荣县—嘉定—峨眉—嘉定—成都—叙州—重庆—上海
第21期滇蜀经济调查班 (1923年5月31日—8月10日)	花田孙平(班长)、石井小太郎、泷口恒雄、釜泽军一、中达健、水田二辅、川又务(随行人员,水田的朋友,明治大学学生)	上海—厦门—香港—广州—北海—海防—河内—谅山—南定—曲靖—咸宁—毕节—永宁—泸州—重庆—万县—宜昌—沙市—汉口—安宁—南京—上海
第21期秦蜀产业调查班 (1923年5月31日—9月10日)	小川清(班长)、若山正义、万泽正敏、益田三郎、小宫熊男、平泽惣二郎	上海—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叙州—嘉定—峨眉—嘉定—成都—绵阳—合川—重庆—汉口—郑州—潼关—长安—洛阳—北京
第21期湘蜀重要物产调查班 (1923年)	备注:该班组原想通过湖南去四川,因日本水兵在湖南长沙枪击市民发生“六一”惨案,且四川土匪多,日本领事馆考虑到调查学生的安全,在征求多方意见后放弃湖南、四川,从汉口改道北上,经郑州—西安—洛阳—郑州—北京—张家口—大同—包头—北京—天津—上海。因此,这个班组并未调查四川,但是日记上的班组名称没改	
第23期滇蜀经济调查班 (1926年5月28日—?)	浜木、毛利、村主、细川、佐竹、五十君、佐藤	上海—香港—海防—河内—昭通—叙州—高场—嘉定—峨眉—叙州—泸州—重庆—宜昌—汉口
第23期蜀秦政治经济调查班 (1926年5月28日—?)	古川、市村、宫本、川户、木下、马场、前田	上海—汉口—宜昌—万县—重庆—合川—顺庆—西充—南部—保宁—广元—汉中—西安—郑州—汉口—上海
第23期四川西部循环经济调查班 (1926年5月28日—7月26日)	木付、菊池、松崎、川崎、泸谷、涂谷、清田	上海—南京—汉口—宜昌—重庆—荣昌—隆昌—富顺—自流井—资中—简阳—成都—嘉定—峨眉—嘉定—叙州—泸州—重庆—汉口—北京

调查期数、班名及时间	主要调查人员	调查路线
第 26 期蜀康 ^① 经济调查班 (1929 年 5 月 23 日—8 月 9 月)	竹内喜久雄(班长)、神河章三郎、村部和義、矢尾胜治、山下长次郎、齐藤晖夫、森口幸藏	上海—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白市驿—来凤驿—丁家拗—永川—荣昌—自流井—资中—成都—嘉定—眉山—新津—叙州—泸州
第 26 期长江调查班(1929 年 5 月 23 日—?)	桥口有恒(班长)、江口涉、福冈英明、林田诚一	镇江—扬州—芜湖—安庆—九江—武穴—汉口—宜昌—万县—重庆
第 27 期长江流域经济调查班(1930 年)	宇敷正章(班长)、竹冈彦次郎、水江满、下川贤、镰田龙男	上海—崇明—南通—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武昌—汉阳—长沙—岳州—沙市—宜昌—万县—重庆—宜昌—汉口—大冶—上海
第 27 期巴蜀岷涪经济调查班(1930 年)	兼松胜(班长)、中滨三郎、友添健策、叶山生	上海—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合川—潼南—遂宁—简阳—成都—嘉定—峨眉—成都—灌县—汶川—茂县—松潘—平武—江油—中坝—绵阳—三台—遂宁—合川—重庆—上海
第 27 期四川陕西经济调查班(1930 年)	深木春夫(班长)、长谷川武雄、中村太郎、岛津真三郎、铃木修司	上海—南京—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自流井—资阳—成都—嘉定—峨眉—灌县—绵阳—剑阁—宁差—汉中—宁陕—西安—潼关—运城—榆次—石家庄—北京
第 28 期云南四川游历班 (1931 年 6 月 1 日—8 月 26 日)	五十岚利贞(班长)、大桥贞夫、田中辰一、宇野正四、远藤进	上海—厦门—汕头—香港—广州—海口—海防—昭通—叙州—嘉定—峨眉—成都—简阳—富顺—自流井—泸州—重庆—宜昌—沙市—汉口
第 33 期四川省游历班 (1936 年)	竹本益重(班长)、织田正一、片山富太、车田修一	上海—汉口—宜昌—重庆—隆昌—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成都—资中—内江—重庆—宜昌—沙市—汉口—郑州—北平—天津—奉天—新京—大连—上海
第 34 期第二十班(四川省) (1937 年)	藤野格、藤冈贞夫、重村俊一、水野铃彦	不详

由上表可知,从 1908—1937 年的 29 年中,除第 21 期湘蜀重要物产调查班临时改变行程,未进入四川外,东亚同文书院组织涉及四川的实际踏查活动一共有 19 期 30 次。每个班组几乎都由 4~8 名调查队员组成,调查时间为 3—6 个月不等。相比于早期日本及西方国家到川旅行者的个人所见,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更加专业且深入,采用了访谈、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结合统计分析和图表绘制等方法,形成了 60 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书。由于近代以来,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对四川经济的调查都离不开金融,而以“四川金融”为核心议题的专项调查报告共计 5 份。

(二)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调查资料的形成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调查的资料融于以上调查资料中,现将其形成情况梳理如下。

东亚同文书院对近代四川金融的调查体现在两本志书中。《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主要根据 1908—1916 年 7 次涉及四川的调查班组提交的调查报告书编撰而成,全志书十编,其中第九编《货币及金融机构》占比较大,编排体例以市镇为中心,对四川 35 个重要市镇的金融情况做了专门调查,共计 35 章,各章内容参差不齐,重点集中于重庆与成都两个城市。《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上、下)出版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为给日军侵略部署提供决策参考,东亚同文书院组织编写《新修中国省别全志》,1941 年首批列入出版计划的是被视为抗战大后方核心区域的云、贵、川三省,其中将四川省列为第一、二卷,云南省为第三卷,贵州省为第四、五卷。该志书对四川的调查相比《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更加详细,多出整整一卷。金融部分集中于第五编经济编第三节之中,在《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基础上,进一步从金融机关和货币两大体系出

^① 第 26 期经济调查班本来计划要到康定的,结果遇到突发情况,就没有去康定,但是这个班级名称是之前他们都定好的,所以即使改了路线,但是该班级名称也不能修改。

发,概括总结了清末民初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金融的发展情况。两本志书前后相继,互为补充,形成了对四川金融较为全面的认识。

东亚同文书院对近代四川的经济调查都涉及金融问题,最集中的体现在1908年第六期、1910年第八期、1911年第九期、1913年第十一期、1914年第十二期、1921年第十九期、1929年第二十六期、1936年的第三十三期等八期中,其中以1913年、1914年、1921年与1929年的调查尤为详尽。1913年陕西、四川班,调查的是川北及川东各地,重点是重庆、彭水两地的金融。1914年四川班调查遍及川东、川南、川西地区的货币和金融机关。1921年第十九期的汉水嘉陵江流域经济调查班、长江上游经济调查班、两湖四川金融调查班,集中调查了重庆、成都以及泸州、自流井、嘉定、合州、顺庆、广元等地金融情况。1929年第二十六期学生也分三个班对四川金融进行了调查,成渝两地仍是调查时间最长的地方,特别是成都^[13]。这些金融调查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路线丰富多样,囊括四川全境,最远到达打箭炉(即今康定)一带。西康是进入西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一样,日本亦抱有由四川侵入和控制西藏的企图,所以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1914年与1921年两次进入川边腹地康定县进行踏查,以期为日本势力渗入西藏做准备。

二是金融调查以重庆、成都为中心。成渝是当时四川的经济重镇,他们认为做好对重庆和成都的调查,就能够掌握四川金融的全貌,所以调查的每条线路几乎都是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

三是调查内容的专业性。从金融调查报告书来看,调查聚焦于四川金融,详细记录了货币流通、汇兑行市、金融机关等金融业关键信息,内容全面且充实。这种专业性得益于东亚同文书院在踏查开始前的充分准备,东亚同文书院给学生们开设了法律、政治、伦理、英语、中文、时文、经济、财政、制度、外交史、通商史、商业学、簿记、商业实践、尺牍、商品学、商业地理、商业习惯等课程^{[3]200}。这些课程涵盖语言、法律、政治、经济、商业等多领域,通过学习,学生们熟练掌握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减少了语言障碍和习俗扞格;系统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财政、金融等专业知识,能够在金融调查中准确分析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趋势;同时接受了严格的社会调查训练,对于商业活动中的社会规范和习惯,商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地域特征及其对商业发展的影响均有所了解。总之,学校全面系统的教育适应了学生们对中国进行深入调查的需求。

四是调查中广泛使用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在四川地区的调查工作,通过资料查询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充分利用了多方资源,包括文献资料与走访资料。首先,在踏查开始前充分查阅中国的经济书籍、年鉴等资料,确定调查地点与主题。其次,踏查中得到日本领事馆及日本在华企业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也得到中国政府中留日人员的协助以及被访谈者的配合。因此,确保了信息源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以及调查手段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二、东亚同文书院调查中的近代四川货币市场

金融为国家之命脉,而货币又为金融之命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银元由于在中国流通时间久、范围广、数量多,成为列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重要工具,且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日本龙洋大量流入东三省和福建等地^[14]。《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把日本龙洋定为贸易专用货币,作为占领市场、控制闽台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工具。为推动日本银元侵入四川,占领四川市场,东亚同文书院于1908—1937年展开对四川货币与货币市场的调查,并形成如下三点认知。

(一)晚清时期四川货币种类相对单一且封闭

由于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鸦片战争后的很长时间里,外国银元几乎没有流入四川,之后外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也没有进入四川,即便是中国机制银元兴起后,各省纷纷铸造银元,四川省政府对银元的铸造也十分审慎。直到 1901 年春,四川总督决定在省城成都设立银元局,1902 年,在重庆设立分局,开始铸造本省银元。

晚清时期的四川货币市场以银两、制钱为主要货币。在白银的销铸方面,四川通行的平码虽多,但主要以当时四川最大的通商口岸重庆的渝钱平为主,成都则用九七平^{[15]375}。1908 年,四川省商务局飭令各府厅州县城乡所用砵码一律改为九七平。重庆因九七平甚为繁杂,渝钱平使用很久,仍多用旧时的渝钱平。四川当时也流行铜元,清末,四川省在成都设立铜元局,因其铸造额甚少,且钱多为川汉铁路公司挪用,所以又在重庆设立铜元局铸造铜元。铜元的种类有 200 文、100 文、50 文、20 文及 10 文等 5 种。重庆的制钱一般专用于交易,并以吊钱为标准每日规定其与其他各种货币的比价^{[15]376-384}。开埠后的重庆是四川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城市,重庆与外省汇兑行市主要由票号掌控,且以银两为主要贸易货币。

总之,晚清四川市场上使用的货币种类相对单一,外国银元与纸币均未进入,外省银元进入有限,本省银元铸造流通不多,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货币,银两用于田赋征收和巨额支付,制钱用于市场零星支付。四川与外省的汇兑市场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大,运行相对平稳。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四川货币市场十分紊乱

进入民国后,四川币制逐渐走向混乱。成都、重庆的货币种类繁多,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应有尽有。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未能到达四川境内,川省督军为增加财政收入,在各地私自设立造币厂,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有军方背景的银行银号以及私营商业银行,甚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公司商号等非金融机构,以及商民个人也擅自发行钞票纸币^[16]。

作为四川内外商贸枢纽的重庆,其货币市场的复杂性更是居全川之首,仅银两一种,除渝平银外,还有省内的成都、嘉定、叙府、泸州、西充、绵州、顺庆、自流井等地银两,省外的贵阳、昆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长春、太原、张家口等地数十种银两,以及本地盐业、杂货、广货、棉纱、棉花、缎子等行业专用银两,每次交易前,双方需先议定使用的银两及平码,再谈价格成交,非常复杂^{[15]379-380}。

成渝地区以外的四川各府州县的货币流通情况,《中国省别全志》有详细调查和记载。

表 2 民初成渝之外四川省其他府州县货币使用统计表^{[15]410-463}

府州县名	货币使用情况
双流县	银两以九七平足色银为标准,也用银元、军票、铜元票、铜元、制钱等
新津县	以九七平票银为标准,银元、铜元、制钱、军票都在流通,但少见铜元票
保宁府	主要流通货币为银元、铜元、制钱。尤其以制钱流通为多
昭化县	制钱、铜元、四川银元、小洋、军票、外省银元等货币
广元县	银元、军票、小洋、铜元、制钱
顺庆府	所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流通银元多为四川银
蓬州	流通货币有制钱、铜元、银元、钞票等。银两以九七平为标准,也有九八平、九六平
广安县 ^①	与其他城市一样,军票不在市民间流通。银两以九七平足色为标准

① 广安县及下文邻水县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进行命名的,与今天的广安市有所区别。

府州县名	货币使用情况
邻水县	流通银元、铜元,流通之银元为四川银。市场上铜元很少,兑换需求强烈时,其价会高于市价
岳池县	不用军票交易。所用银元为四川银。铜钱为九八钱
叙州府	没有铜元票流通,却多见钱铺及其他商铺所发行钱票的流通
叙永厅	单独开业的钱庄有 2~3 所,规模甚大,以兑换、发票、放款、存款、汇兑为业
合州	流行银元,也有制钱、小银货流通。银两最为普遍之平码为九六、九七两种
涪州	所用银两种类有大锭、中锭、珠子、块头、件数等。银平为九七平。日常交易用制钱,虽有铜元流通,因供给甚少,使用尚未兴盛。所用银元为四川银。不见有银票、钱票之类
酉阳州	通货大部分为铜元,制钱虽有流通,难称盛行。也有四川银元流通,难称盛行
龚滩	日常小额交易以铜元和制钱为主,制钱盛行。所用铜元虽含四川省的铜元,但大部分是湖南、湖北的铜元。银元未盛行
梁山县	所用银元中以四川银、湖北银最多,军票甚少用于市民间交易
夔州府	以九七平足色银为通用银,银元兼用四川银、湖北银。纸币为当地著名钱庄发行的兑换券
巫山县	以九七平足色银为标准。所用银元主要为四川银、湖北银,也用北洋银
万县	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为四川造、湖北造和鹰洋等
潼川府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以四川银为主
中江县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票银,银元为四川银
赵家渡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为四川银,无外地银元
蓬溪县	主要银元为四川银,甚少用湖北、北洋等地银元
太和镇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一般为四川银,甚少见外省银元
嘉定府	大宗货物交易用周行银付定金,而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则几乎看不见军票流通,也看不见铜元票流通,所用铜元为九九铜元,制钱为六提
邛州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铜元、制钱等皆流通
泸州	多混用恶钱,铜元为满钱,制钱以 1 010 文为 1 吊钱
雅州府	以九七平足色银为标准,也用银元、铜元、制钱
天全县	所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有云南、湖北的银元,也用铜元、制钱
清溪县	所用铜元为九九铜元,制钱为满钱六提
打箭炉	小买卖多用藏元
泸定县	所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为四川银,也流通湖北、云南造的银元。此地除铜元、制钱外,也用藏元

由上表可见,北洋政府时期的四川,成渝之外的其他府州县,货币的使用同样十分混乱。大部分地方使用九七平,同时还使用其他种类的货币。紊乱的币制造成四川一省之内货币分区流通,导致各府州县商贸来往不畅,给四川的商务活动造成严重损害。

(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四川货币市场从混乱逐渐走向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四川省名义上隶属中央,实际上仍是军阀混战,币制混乱。据《新编中国省别全志》记载,1929—1935 年,四川货币空前混乱,银两、银元、制钱、纸币等多种货币并行使用,仅银元种类就多达 26 种,其种类和主要流通区域如下表。

表 3 1929—1935 年四川银元种类及其流通领域表^{[17]310-311}

种类	名称	主要流通区域
大洋	汉板大洋、川板龙洋、江南龙洋、袁头大洋、中山大洋、大清银币、湖北银币、北洋大元、广东龙洋、安徽龙洋、造币总厂币、北洋机器局币、鹰币、开国纪念洋、云南龙洋、杂色川洋	四川各县
半元	川龙半元	江津、合川、永川、古宋、罗江、眉山、潼南
	云南半元	三台、安岳、乐至、潼南、蓬溪、射洪、中江、汉源、富顺
	厂造半元	成都、什邡、新繁、古宋、兴文
	袁头半元	富顺、自流井、洪雅、眉山
	唐头半元	洪雅、汉源、江安、古兰、眉山、潼南
	杂色半元	云南半元或者是长板使用区域
角洋	广东双毫	富顺、西江、资中、宜宾、古宋
	龙毫	泸县、荣昌、江安、叙永、古兰、庆府、兴文、南溪、隆昌
	单角	富顺、西江、资中、宜宾、古宋、泸县、荣昌、江安、叙永、古兰、庆府、兴文、南溪、隆昌
	杂色毫洋	富顺、西江、资中、宜宾、古宋、泸县、荣昌、江安、叙永、古兰、庆府、兴文、南溪、隆昌

纸币虽在清末的四川已有发行与使用,但数量不多,流通时间短,尚属平稳。辛亥革命爆发后,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设四川银行,专发四川军用票,总发行额达 1 200 万元。因其滥发,以致币值严重下跌^{[15]401-403}。1913 年 6 月,隶属于财政厅的总钱庄在总府街设立,发行铜元券作为小额货币,由于发行量失控,更加剧了市场的混乱^{[18]219-223}。此后,有新式金融机构发行过纸币,自 1929 年后,四川的中国银行、大中银行、中和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重庆市民银行等均发行纸币,其中中国银行发行额达 300 多万元,四川美丰银行和川康银行各发行 200 万元,重庆市民银行发行 100 余万元。1933 年,刘湘击败刘文辉,统一四川。鉴于四川经济濒临破产,社会金融极度混乱,为维持军政费用需要,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名义下令筹建四川地方银行,旨在发行“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简称“地钞”),试图统一四川货币。1934 年,四川地方银行设立,发行十元、五元、一元及五角、两角等券种。由于军需庞大,“地钞”发行高达 3 000 万元,导致纸币泛滥,价值暴跌。四川地方银行也因发行准备不足,遭遇挤兑危机,被迫于 1935 年改组为四川省银行^{[17]558}。

1935 年法币改革后,法币在四川各地开始流行,由于四川深处中国西部内陆,法币在四川的推广一度进展缓慢^{[17]310-311}。直到 1936 年第三十三期学生在四川调查时,才发现法币在乡村也推广了^[19],这表明四川的币制终于趋于一统。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货币与货币市场的长时段考察与调研,目的不仅是了解四川货币状况,更是为日本企业进入四川投资,争夺四川贸易和货币主导权提供经济情报,帮助日本更好把握中国市场脉搏,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机构的探查与研判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它们不仅是列强在华获取经济利益的中枢,更是列强在华攫取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晚于其他列强,但也希望通过在华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实现这一目标。早在甲午战争前的 1893 年 5 月,日本即在上海南京路 15 号设立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办事处,经营上海与日本间的国际汇兑业务。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全面展开,中日贸易急剧扩大,1895 年 12 月,正金银行

决定将上海办事处升格为独立统辖行,形成正金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网,以此来控制中国的金融^[20]。为此,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机构的调查中,既重视外资金融机构对四川的渗透,也关注四川本省金融机构的现代化演变程度。

(一) 进入四川的外资金融机构相对缺乏

晚清时期,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清末民初,进入四川的外资银行仅汇丰银行一家。在重庆,“汇丰银行多派中国人作代理,此行专事关税之收存,与金融业之关系甚少”^{[21]446}。在成都,出现了中国人委托外国传教士汇款的情况。成都人很多委托福音堂的传教士在上海汇丰银行收受现金银两^{[15]405}。

相对外资银行,进入四川的外资保险机构却要多些。据《中国省别全志》记载,进入四川的外资保险公司主要是保家行(North China Insurance Co.)与扬子保险公司(Yangtsu Insurance Association Co.)两家英商保险公司^{[15]450}。据1929年第26期学生森口幸藏的日记记载,在重庆的日本人大都都从事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其中从事保险业活动的人最多^{[13]200-201}。

进入民国以后,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金融界曾雄踞一方,但当时进入四川的并不多,主要是两个中美合资银行,一个是中华懋业银行,该行成立于1919年,总行设于北京,到1921年左右,重庆分行的业务并未开展起来。另一个是四川美丰银行,1922年4月创立,总行设于重庆,是西南地区近代史上最有实力的一家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到1927年,美国撤资,这家银行变成了华商独资银行^{[18]601,647,686-689}。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调查中发现,沿长江西进的外国银行,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汉口,暂时尚未深入到上游的重庆。日本在汉口设立的银行数量居各国银行之首,有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住友银行与汉口银行等4家。调查认为在汉口建立日本银行对于提升在华日本人的地位,以及抢占华中商贸市场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8]636-640}。然而,汉口的日资银行业务却因中国的持续反日运动受到冲击,日本在汉口开设银行的一切交易活动被迫停止,加之一战后欧美各国卷土重来,汉口日资银行的发展举步维艰。为此,学生们呼吁日本政府对此现象要予以重视^{[18]663-667}。

针对上述情况,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日本银行应该从汉口再往西延伸,深入到中国西部内陆四川省^{[18]696-697}。四川幅员辽阔,和云南、陕西、贵州、西藏接壤,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发,很有可能成为仅次于汉口的又一大市场。而重庆是长江沿线最西端的开埠城市,是外国势力进入四川的桥头堡。因此,日本也应该抓住机会,将日资银行建到重庆去^{[18]684-688}。“我们希望可以尽早看到我国的银行在重庆建立起来,这样的话我国就可以掌控四川省贸易的霸权。”^{[18]691}

(二) 全面抗战爆发前传统金融机构在四川的嬗变

传统金融机构的概念是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才产生的。中国古代社会,金融业以票号、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为主体,进入近代以后,为了与新兴的从西方引进的以银行、保险等现代金融机构相区别,故而将票号、银号、钱庄等机构称为传统金融机构。

通常认为,辛亥革命给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以致命打击,票号的命运伴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走向终结,但从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的调查中可见,辛亥革命以后,票号在四川虽走向没落,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在重庆,尚存天顺祥票号^{[21]445}。在成都,到1916年,仍有蔚盛长、百川通、蔚丰厚、蔚长厚、蔚泰厚、日升昌、宝丰隆等7家票号在活动^{[15]386}。

民国后,四川票号逐渐被钱庄替代,而后钱庄进入繁盛时期。四川省实力最强的钱庄集中在成渝两地,重庆钱庄最多时有50余家,成都钱庄有30余家^{[18]710}。以重庆为例,此时票号无处可见,但钱庄却遍布全市,且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街、打铜街及曹家巷等繁华商业区域,其中大型钱庄有23家^{[18]797-801}。后因军阀持续混战,时局动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重庆钱庄陷入困境,1925

年,钱庄数量锐减至30余家。1935年,重庆钱庄仅存7家。此后有所好转,到1937年时,重庆钱庄数增至22家^{[17]543-544}。成都钱庄为寻求发展,1928年,与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等新式银行一起,共同组建成都市银行钱业公会,但到1934年,由于银行退出,钱庄势力受到削弱,截至1937年,成都剩余大型钱庄12家^{[17]545-546}。根据书院学生的调查统计,四川各府州县都设有钱庄,钱庄数量变化与成渝情况大致相同,清末民初达到鼎盛,随后因军阀混战的持续影响,钱庄遭受重创,相继倒闭,余下亦寥寥可数。

在当时的四川农村地区,典当业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作为一种以实物为抵押的借贷方式,深深植根于民众生活之中。1935年前后,四川农村地区的典当业达到相当规模,当铺数量超过400家^{[17]573-576},显示了典当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三)新式金融机构逐渐成为四川金融业的新生力量

近代中国新兴的华商银行业,以1897年创立于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至宣统末年(1911年),可谓中国银行业之萌芽时代。据相关统计,从1897—1911年,中国的新式银行共设20家,均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在西部内陆的四川,仅有濬川源银行与四川银行2家^[22]①。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证实了四川新式银行始于清末1899年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四川官办银行始于1905年创立的濬川源银行,1908年大清银行在四川分别设立了重庆、成都等2个分行^[23]。对民国建立之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四川新式银行的情况,东亚同文书院更是有较为详尽的调查:四川先后设立新式银行39家,其中四川本地设立的银行有33家,国家银行在四川设立分支机构的有4家,外省商业银行在四川设立分支机构的有2家。四川新式银行主要集中在成渝两地,特别是四川最大的商贸城市重庆,占四川本地银行的2/3。四川本地银行的分支机构则集中于万县、泸州、内江、宜宾、绵阳、自流井等少数商贸发达的城市,省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宜昌、汉口、上海等地,以及北方的北京等少数大城市^{[17]550-553}。

值得强调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新式银行的调查中,非常重视新式银行与经济的关系,尤其关注银行对四川交通的投资,如民初与四川铁路建设密切相关的两家铁道银行就是其关注的重点。一家是川路公司附设的阜川银行,另一家是四川铁道银行。阜川银行总行设于成都,1913年5月开始营业,主要从事贷款、汇兑业务。在重庆、泸州设有分行,对宜昌、汉口、上海、北京开展汇兑业务。该行筹设是“由于川汉铁道工程的延期,为了能在其他有利的方面利用资金”。通过其章程可见,这家银行的资本来自川路公司股款内专项提出的现银100万两,预定营业30年,明确规定“本银行于铁道未开工以前,遵照银行通行则例所载办理3个月或6个月的短期借贷,以及存款、汇兑、拆息、兑换金额等业务”^{[24]185}。1914年11月12日,四川铁道银行总行开办于泸州会津门城墙,在重庆设分行,对成都、重庆、上海、汉口、北京开展汇兑业务,计划打开与沙市、顺庆、万县、自流井、叙州府、打箭炉的交易路径^{[24]224}。此外,东亚同文书院还特别关注重庆,认为重庆是进入四川的首站,日本人应该在重庆着手两种行业:一个是仓库业,一个就是银行业。因为目前在重庆还没有仓库业这个行业,而且各家公司在码头卸货以后还要把货物运往自家的仓库,极不方便,如果在码头附近建仓库,发行仓库证券,来保管储存货物,这样一定会受到商家欢迎。他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时重庆虽然有新式银行,但是旧式金融机构势力仍然强大,且新式银行发展不完备,日本人正应该在此等情形下在重庆建立有相当雄厚资本和信用的新式银行,以此来对抗重庆现存的旧式金融机构^[25]。

对于四川本地创设的新式银行,东亚同文书院在调查中不仅重视聚兴诚、四川美丰、川盐等

① 另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所编《全国银行年鉴》(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年出版)的统计,此一时期的新式银行仅为17家。

具有影响力的川帮银行,对于一些服务于商业经济建设的专业银行,亦十分关注。如1932年清理川盐银行后重新募集50万本金建立的自流井裕商银行以及1934年唐子晋以本金100万元创立的四川建设银行等。自流井裕商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各种存款借贷、汇兑等。四川建设银行主要用于辅助各种建设事业,发展农工商业。除此之外,东亚同文书院还特别关注当时四川的农村银行,如1931—1935年四川省内设立的5家农村银行,即北碚农村银行、荣昌堂香农村银行、江津县农工银行、垫江农村银行、金堂农民银行。

在四川的新式金融机构中,除了银行,保险、票据交换所等新式金融机构也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关注,如当时川省唯一的保险公司——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此外,外省保险公司在四川建立分公司的有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华安合群寿公司、宝丰保险公司等4家,设立代理处的有8家^{[17]575-576}。1935年,银行联合库成立,正式进行票据交换。1936年,重庆的银钱业者将票据交换的清算事务委托给中国银行,并由中国银行出资300万元设立票据交换所。此后,多家银行和钱庄加入了重庆票据交换所^{[17]568-572}。

总之,从清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外资金融势力在四川较弱,整体而言,四川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但四川金融现代化的步伐却在不断加快。体现在传统金融机构经历了从票号到钱庄的转变,且不断衰微,而新式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成为四川金融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它们不仅打破了旧式金融体系的垄断,为四川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这些新式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的设立、业务的拓展,还是保险公司的兴起,都标志着四川金融业正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不过,其地域分布仍不平衡,大多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大商贸中心,尤其是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商埠,逐渐发展成为四川乃至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

四、结 语

日本认为先于自己进入中国的欧美国家,长时间局限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区活动,未能深入中国内陆。究其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民间的商业形态、惯例和组织形式,因而只能依靠买办。日本要在中国市场上超越欧美,攫取更多在华利益,甚至独霸中国,就必须深入广大内陆地区,了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的实情。重庆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获得的长江上游的唯一通商口岸,也是日本进入四川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的跳板。作为近代日本重要的教育机构与情报收集机构的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长达29年的持续踏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东亚同文书院以团队的形式,对四川进行长时期反复踏查,形成的众多考察日记与调查报告,超越了之前欧美各国以游历者个体通过考察日记或者游记的方式呈现的调查文献,显露了日本在当时对中国的觊觎之心,充当了日本对中国实施侵略和殖民的工具。这些调查资料或在日本各界对华经济贸易决策中发挥作用,或被运用于日本的军事决策,尤其是军需供给中发挥作用。

东亚同文书院对于近代四川金融发展的梳理,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变迁与金融生态的复杂与多样,揭示了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金融现代化的基本格局。在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中,四川的金融市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金流动场所,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新式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并存与竞争,外资金融机构的渗透与本地新兴金融机构的艰难成长,不仅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四川在被迫开埠进程中的相对滞后与困境中执着前行的足迹。

东亚同文书院所刻画的近代四川金融业的基本面貌,客观上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变迁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了发人深省的镜鉴。必须指出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

的调查是日本人关于整个四川省调查的组成部分。总体上看,是对华实施野蛮侵略链条中的一环,是为日本开展经济侵略,乃至发动侵华战争服务的。因此,其调查所形成的认识与结论,有些自然也成了日本进行经济侵略以及发动侵华战争的决策与部署的依据。在当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捍卫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利益?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无可回避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历史性课题;通过对东亚同文书院关于四川金融,乃至整个中国的调查历史的深入研究,应该对于解决上述重大问题有所裨益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 谭忠艳. 满铁调查机构变迁及其侵略性的体现[J]. 理论观察, 2018(2): 64-66.
- [2] 王玉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满铁研究述评[J]. 日本问题研究, 2022(4): 58-67.
- [3] 大学史编撰委员会.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M]. 东京: 沪友会, 1982.
- [4] 郝祥满, 魏仕俊. 日本侵华战略下的对华调查——以东亚同文书院茶业调查为例[J]. 近代中国, 2024(2): 134-150.
- [5] 连馨. 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在华情报网构建[J]. 历史教学问题, 2024(6): 130-139.
- [6] 王雪驹. 清末民初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编纂与出版考述——以甘肃省资料为主[J]. 新闻春秋, 2025(1): 88-95.
- [7] 张珺. 东亚同文书院的海南岛调查[J]. 南海学刊, 2023(3): 95-103.
- [8] 易丙兰. 东亚同文书院在近代湖南的情报调查活动探析[J]. 湘南学院学报, 2022(3): 49-55.
- [9] 蓝勇. 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3): 127-139.
- [10] 李彬. 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的调查——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为研究范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1): 193-197.
- [11] 东亚同文书院. 同舟渡江: 打箭炉[M]. 丰桥: 爱知大学出版社, 2006: 371-372.
- [12] 东亚同文书院. 旅行记年度选本: 第6~34期[G]. 丰桥: 爱知大学出版社, 2006.
- [13] 冯天瑜, 王晓, 郭传芹. 森口幸藏日记[G]//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 第18册第16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300.
- [14] 千家驹, 郭彦岗. 中国货币史纲要[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92.
- [15] 东亚同文书院. 中国省别全志: 第10册[M]. 北京: 线装书局出版社, 2015.
- [16] 冯天瑜, 王晓, 郭传芹. 两湖四川金融機関貨幣の部[G]//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 第139册第28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6.
- [17] 中国省别全志刊行会. 新编中国省别全志: 第2卷四川省下[M]. 东京: 东亚同文会, 1941-1946.
- [18] 冯天瑜, 王晓, 郭传芹. 两湖四川新式银行[G]//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 第139册第29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 [19] 东亚同文书院. 南腔北調: 成渝街道を行く[M]. 丰桥: 爱知大学, 2006: 265.
- [20] 郭予庆. 近代日本银行在华金融活动——横滨正金银行(1894—1919)[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84-185.
- [21]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中国省别全志: 第5卷四川省[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
- [22] 唐传泗, 黄汉民. 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C]//《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第4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63.
- [23] 冯天瑜, 王晓, 郭传芹. 扬子江上游之金融[G]//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 第136册第25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476.
- [24] 戴建兵. 中国各省金融全志——清末民初日本对华金融调查资料(上)[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3.
- [25] 东亚同文书院. 虎穴龙额: 蜀秦鄂纪行[M]. 丰桥: 爱知大学出版社, 2006: 109-110.

责任编辑 江娟丽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